



[第3卷]

AMERICA A NARRATIVE HISTORY

美国史

(美) 乔治·布朗·廷德尔 大卫·埃默里·施 著 宫齐等 译



AMERICA

A NARRATIVE HISTORY

美国史

[第3卷]

(美)

乔治·布朗·廷德尔 (George Brown Tinda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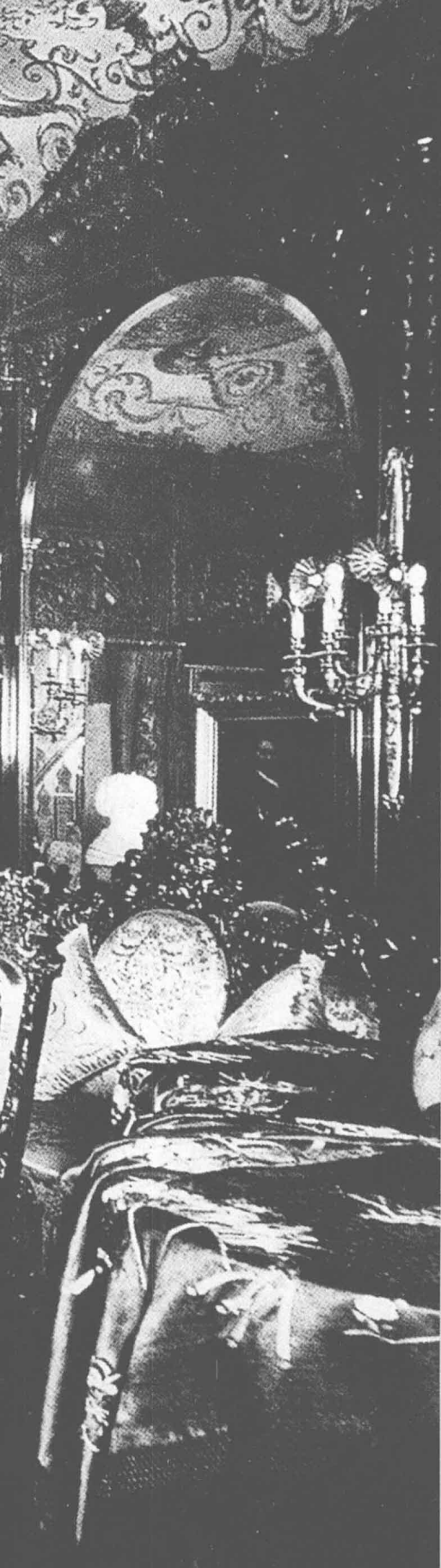
大卫·埃默里·施 (David Emory Shi)

著

宫 齐 李国庆 裴霜霜
俞文中 曾光涛 张丽平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中国·广州



PART FIVE

第五部分

— · GROWING PAINS · —

日益加深的痛楚

1865年联邦政府的胜利维持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完整，这一过程也加速了美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变。明显的国家意识开始取代战前的地区性意识。内战期间及内战之后，共和党领导的国会推动了鼓励工商业发展和西部开发的各项立法。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抛弃了杰斐逊主义梦想——建立非中央集权农业共和国，开始打造充满活力的新型工业经济，并与越来越全国化甚至国际化的市场一起发展。

1865年之后，很多美国人把注意力转向战前就已经开始但尚未完成的城市工业革命和大陆殖民运动。全国性的巨型企业以规模生产和市场为基础，开始垄断经济。著名经济学家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评论说，工业发展的进程“制约着我们所有人，因为我们置身于其中。它创造了我们生存的条件，限定了我们社交活动的范围，约束了我们社会关系的纽带”。

工业革命不仅仅是一种城市现象，它也改变了农村生活，凡是阻碍高度机械化及商业化大型农业和牧业发展的人都会毫不客气地被推到一边。一位新英格

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是美国经济和文化发展、动荡的时期。镀金时代带来的经济繁荣加剧了美国的城市化进程，大城市的发展掩饰了社会矛盾的逐渐激化。这是1899年美国纽约的豪华住宅，显示了上层阶级的奢华。

兰人强调说，农场的伙计们“必须理解经营农场就是经营生意，否则他们的日子就不会好过”。新市场势力和传统社会习俗之间的冲突引起了19世纪最后25年间的政治动荡和社会不安。社会断层线到处都是，它们引起强烈的震撼，其对政体的影响力正如一位作家所形容的“像地震和旋风”。

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于19世纪90年代发展到高峰，这是美国历史上冲突最多的年代。严重的经济萧条、农民骚乱和工人暴动使人担心爆发阶级之间的战争。这种动荡的局势使1896年的总统选举演变成一场竞争对手之间展望美国未来的斗争。共和党候选人威廉·麦金利宣扬支持现代城市工业价值观，而民主党和平民党共同推选的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他激扬文字坚决捍卫美国昔日的农业价值观。威廉·麦金利的胜利是美国政治和社会历史的分水岭。1900年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并在国际事务中成为新的领导者。

南方与西部的变革



美国的西进运动对印第安人的生存造成了极大威胁，这幅《遥望火车》表现了印第安人面对现代文明时的无奈与迷茫。

内战之后，南方和西部为美国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了各种诱人的机会。1860年之前，绝大多数美国人把密西西比河与加利福尼亚之间的广阔土地视为不毛之地，不适宜居住也不适宜耕种，是一块仅适宜印第安人和动物生存的不受人欢迎的土地，比如说，内战结束时得克萨斯州有一半的土地无人居住。不过1865年之后，美国联邦政府鼓励向西部移民，鼓励西部经济开发。很多因素综合起来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开拓者和寄予厚望的资本家向西迁徙，这些因素包括横跨大陆铁路竣工，军事征服印第安人和慷慨分配土地等。得克萨斯州一位牧牛者查尔斯·古德奈特回忆说：“我们是这一大片土地的探险者，那里新奇，对勇敢者充满诱惑。”

虽然在19世纪50年代出现了第一波铁路建设热潮，但是直到内战结束后也就是19世纪的最后25年才迎来了铁路建设的高潮。全国铁路网从1865年的56,300千米发展到1897年的322,000千米。横跨大陆的铁路打头阵，为平原和远西的殖

民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然，建设这样一个四通八达的铁路网的费用非常高昂，为筹资建设铁路而发行的长期国债成了1893年经济恐慌及后来的经济萧条的主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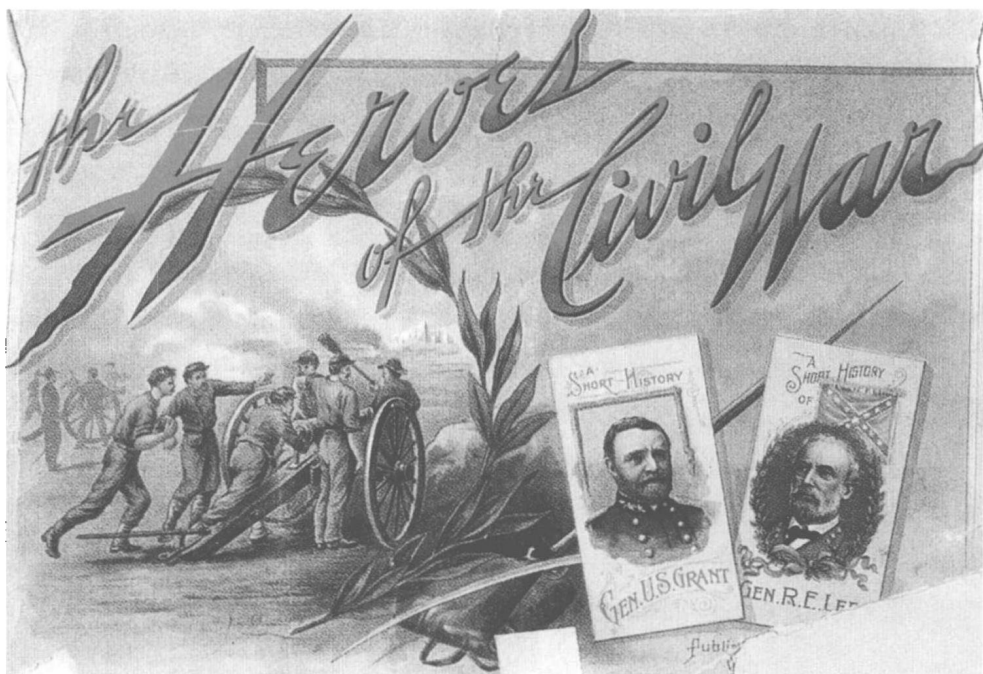
内战之后，南方铁路线被重建或增加铁路支线，战败的南方也为投资和工业发展提供了一块肥沃的土壤。1865年之后“新南方”的鼓吹者认为，这一地区必须抛弃以农业为主的单一思想，应该追求工商业共同发展。结果南方和西部在19世纪的最后30多年里都经历了重大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到1900年南方和西部的变化出人意料，而且在西部地区建立了14个新州。

新南方

新视野 经历战争失败的阵痛时，很多南方人在战争的废墟中追忆往日的庄园生活，但是自从1861年在萨姆特堡打响战斗的第一枪开始，这种主宰南方的生活方式就一去不复返了。而一些颇有影响的领导人坚持认为，战后的南方必须从怀旧情绪中解脱出来，创造一个集小庄园、繁荣工业和繁华城市为一体的现代社会。宣扬新南方思想的主要有亨利·W.格雷迪，他是《亚特兰大宪政报》(*Atlanta Constitution*)的编辑。19世纪90年代，他描绘了一幅令南方人向往的图画，他说：“旧南方处处都依赖奴隶制和农业，但人们并不知道奴隶制度和农业既不能提供也不能维持健康的发展。”而新南方则体现了小农经济的“完美民主”和多元化工业。他相信，战后的南方将会拥有真正民主，一种不再由庄园主贵族主宰，也不再依赖奴隶劳动的民主。

亨利·W.格雷迪把新南方的前景描绘得不可思议，吸引了很多支持者，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宣扬工业发展的好处。他们认为，南部邦联政府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过分依赖棉花大王(King Cotton)，将来南方必须以北方为榜样实现工业化。从这些中心内容中又演绎出一些必然的结果：更多元化、更有效的农业将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进一步普及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将促进物质繁荣；地区和平与种族和睦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

经济发展 新南方的主要成就是本地区纺织工业的发展。从1880年到1900年，南方的



内战英雄

这是华盛顿·杜克之子公司发行的画册封面，上面印有尤利西斯·S.格兰特和罗伯特·E.李将军的肖像，目的是推广自己的香烟。

棉花作坊从161家增加到400家，作坊工人（其中妇女和儿童的数量超过成年男子）增加了5倍，对棉花的需求增加了8倍。

烟草种植也显著增长。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的杜克家族对烟草工业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传说在内战结束时，华盛顿·杜克带着一仓库的烟草，在3个儿子的帮助下用山核桃棒把烟草捶扁，装进袋子，装上马车，套上两头驴，走遍全州，边走边卖。到1872年，杜克家族已经拥有了一家年产125,000磅烟草的工厂。不过此时华盛顿·杜克准备退休享受成功，开始过安定的生活。

但是他的儿子巴克（即詹姆斯·布坎南·杜克）想要争取更大的成功。他认识到烟草工业就是“一半香烟一半大肆宣传”的行业，所以他在广告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巴克还以比竞争对手更低的价格在对手市场上抛售产品，并垄断原料供应。最后他的竞争者们都不得不同意与他联合。1890年巴克把其中大部分都收购纳入美国烟草公司，该公司控制全美国90%的香烟生产，在1904年占全美国大约四分之三的烟草生产。1911年最高法院裁定这家公司违反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并命令将它拆分开来。但那时巴克已经发现了要征服的新领域：水力发电和铝。

对其他自然资源的系统利用有助于开发从西弗吉尼亚到亚拉巴马之间的阿巴拉契亚山周围的地区。南方的煤炭生产（包括西弗吉尼亚州）从1875年的500万吨增长到1900年的4900万吨。19世纪70年代，在那些山脉的南端，在红山脚下，兴起了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不久，建设者们就把这座城市称为南方的匹兹堡。红山因其富含铁矿石而得名。

工业增长刺激了对房屋的需求。1870年之后伐木工业在南方十分繁荣，伐木营地遍布山峦和平原。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们的产品主要是南方松，产值远远超过纺织品。尽管伐木会破坏生态平衡，但是看上去没有休止的迹象。幸好由于南方气候温暖，新种植的森林生长很快，再加上林业科学崛起，伐木业才得以生存。

要实现亨利·格雷迪在19世纪80年代设想的多元化工业，南方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但是南方工厂生产了大量其他的产品：牡蛎、蔬菜、罐头水果、皮革制品、白酒及其他饮料、黏土、玻璃、石材产品、南卡罗来纳州沿海和佛罗里达州生产的磷肥、纽波特纽斯造船公司和船坞公司制造的船舶和战舰。

新旧农业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南方大部分地区仍不发达，至少按照东北部的标准是仍不发达。尽管亨利·格雷迪及其他新南方发言人对南方农业有一种乐观的憧憬，典型的南方人更乐意赶着毛驴耕田，而不愿意——用十分流行的说法是，去照料一部织布机或一个炼钢炉。在内战期间幸免于难的棉花大王在出口市场上表现平平，但它在新土地上不断成功扩张。路易斯安那州的糖蔗也许是受战争影响最严重的农作物，到19世纪90年代也茂密地生长起来了。

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沿海地区和其他水稻种植区，随着铁路和冷藏车厢的问世出现了蔬菜种植业，而且发展迅速，但南方的广大农民并没有变得富有。农作物价格持续低迷，这在19世纪的最



1870年在密西西比采摘棉花的景象

由于佃户们没有照料土地的积极性，再加上地主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能监督他们工作，所以租佃种植的效率极为低下。

后3年里对美国整个西部都造成重要影响，农作物价格迟迟不涨使农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难拥有土地。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用谷物交租的佃农和租佃户越来越普遍。到1890年，南方绝大多数耕地的农民都没有土地。在南方南部纵深地区，农民拥有土地的比例很低，南卡罗来纳州39%，佐治亚州40%，亚拉巴马州42%，密西西比州38%，路易斯安那州42%。这击碎了亨利·格雷迪关于南方小土地民主的梦想。

用谷物交租种地的方式和租佃是怎么运作的呢？用谷物交租的农户什么都没有，只能为地主出卖劳力，并以此换取必要的生产物质和谷物分成，谷物分成一般是一半。租佃户也没有土地，但可能有自己的骡子和犁，并与乡村商店有一定的信用关系，也有权要求分得更大份额的收成，但一点都不富裕。佃农一租佃户制度效率低得可怕，而且滋生腐败，它在本质上是南北战争之后奴隶制的土地版本。地主和租户之间相互猜忌，地主们还经常欺骗为他们种地的租户，不分给应得的收成，因此双方关系紧张。

战后南方资金严重短缺，人们要想方设法不用现金经营，于是出现了作物留置权（the crop-lien）制度，这是一种创新。农村的商人为小农们提供生产物资，换取作物收成留置权（或抵押）。这种信贷为一些农民提供了出路，代价是失去了自主权，但对大部分人来说，那只是提供了一种长期无望的债务循环。根据一个出版物的描述，由于商人承担巨大的风险，他们收取的利息通常“低为24%，高则相当于偷窃”。这些商人像庄园主（通常是同一个人）一样，要求他的农民客户在收割时要兑现收成，所收谷物要随时可以出售。由于新南方农业多元化倡导者的极力宣传，用谷物交租种地方式和租佃运作模式推动了棉花等主要农作物的销售、供应和信贷系统。落后的农村生活把数以百万计的黑人和白人困于穷困和无知之中。

租佃与环境 用谷物交租种地和租佃种地方式的普遍使用在无意之中造成了深重的环境破坏。在同一块土地上年复一年地种植经济作物，比如说棉花，把土壤中的养分都榨干了。由于土地不是自己的，佃户们没有打理土地的积极性，既不施大粪一类的有机肥也不实行轮作，为加快生长周期，他们使用化肥。大量使用磷肥可以保证一年耕种几轮，但另一方面却会加速土壤的损耗。一位观察员说，化肥让南方的农民以为“找到了致富的捷径，找到了一条年复一年丰收棉花的好路子。结果是他们的土地年复一年地耕种，越耕越贫瘠，土壤肥力被消耗殆尽”。

土壤一旦丧失了肥力，佃农就转移到另一个农场，留下一片片沟壑纵横的土地，任雨水冲蚀。淤泥和泥浆流入小溪和河流，淹没许多低地，塞满水塘和湖泊。到20世纪初，南方许多农村好像到处都是遭受蹂躏的土地：深深的溪谷把因侵蚀而裸露的小山一

分为二，淤泥塞满了河流和湖泊。就肉眼所见而言，眼前的景象就是大片大片失去肥力的红色黏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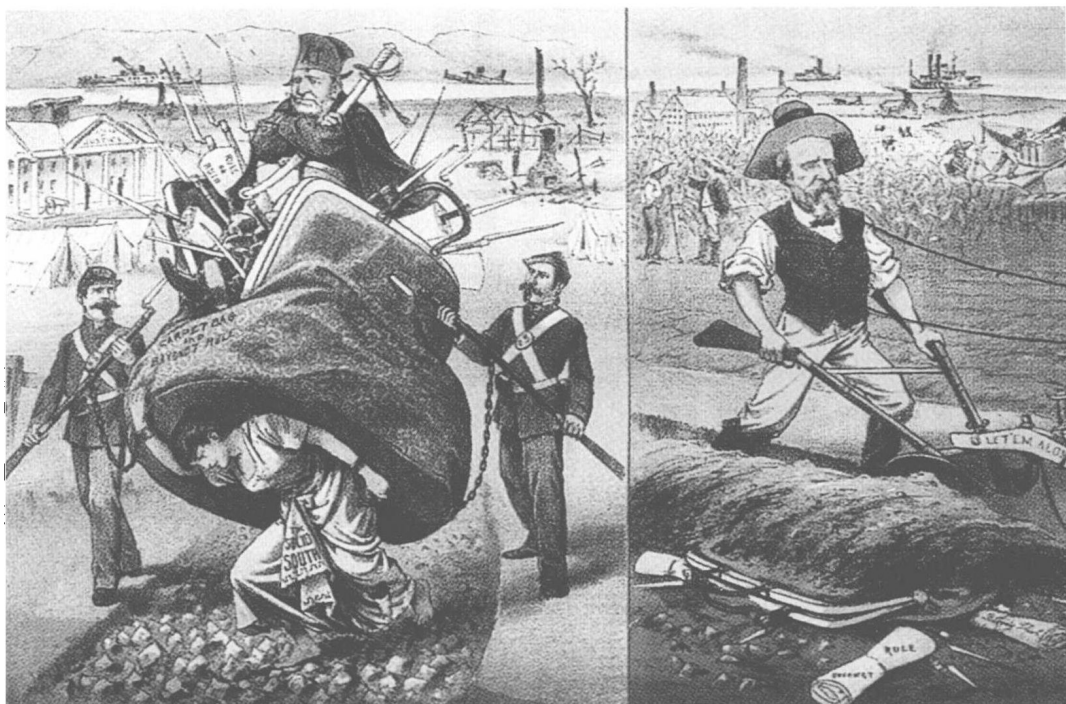
波旁拯救者 南北战争之后，社会顺从习惯和政治优越感在南方政治中依然盛行。南卡罗来纳一位前南部邦联军官指出，“每一个社区有一个大人物，或较他次要的人物，老百姓们想要打听消息时就聚在他们周围，毕恭毕敬地听他们口若悬河的高谈阔论”。南方重建之后，政治就掌握在一群群这样的人手中，他们统称为拯救者或波旁派¹。战后民主党领袖的支持者们称他们为拯救者，因为他们拯救或保护了南方，使之不再受北方佬的统治，使之脱离纯粹农村经济的束缚。拯救者们包括新兴的企业家阶层，他们渴望依靠工业和铁路的发展推动一个更多元化的经济。拯救者的对手们则把他们列为波旁派，并试图把他们描绘为法国波旁王朝式的反动分子，而不是进步人士。拿破仑曾经说过，法国波旁王朝的皇家贵族在革命的洗礼中什么都没有忘记，什么也没有学到；人们也认为战后南方波旁派在内战的洗礼中什么都没有忘记，什么也没有学到。

新南方的波旁派改善了与北方保守分子的政治关系，也改善了与北方资本家的经济关系。他们都想推动政府紧缩和节俭的财政政策，但是支持免税政策及对商业的种种优惠。与此同时，波旁派州长们和立法者们抨击各州的支出，包括给那些重建时期开办的公立学校拨款。1871年大西洋沿岸南部各州平均每个小学生的支出为10.27美元，1880年降到6美元，1890年是7.63美元。1882年南卡罗来纳州有3183所学校，但只有3414名教师。那时南方的文盲率本地白人约为12%，黑人为50%。

他们还极力要求减少本州在刑罚制度上的支出，为此出现了波旁派执政中最肮脏的污点：罪犯租赁。战争破坏了监狱，各州财政也很匮乏，各地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却旺盛。为了避免监狱费用支出并增加收入，他们就想出监狱劳力出租的坏主意。由于各州对这种做法没有监管，被租赁的罪犯的工作效率低下，用人方疏于管理，草菅人命，而且这种情况越演越烈。白人政治领袖们和经济领袖们常常用种族观为此辩护，企图使之合理化，因为被出租的罪犯绝大多数是黑人。他们声称，一个“低贱”和“懒散”的种族需用一种高压强制的统治方式才能使之进化，使之摆脱懒散无序的生活方式。

波旁派不仅减少州开支，而且减少政府债务，其手段十分简单，就是拒付绝大部分债务。人们认为激进派统治时期的腐败和铺张浪费是南方重建过程的合理表现，但拒付债不止于因为重建而产生的债务：9个州所拒付的债务总额超过它们所欠债券持有人和债权人的一半。

1 Bourbons，又称为波旁民主党人，社会政治上的反动分子，尤指南方民主党中持极端保守观点的反动分子。——编注



激进派和波旁派统治对南方的影响

这幅1880年的漫画描绘了南方在军事化重建高压下踟蹰不前的景象（左），以及在总统拉瑟福德·B.海斯和波旁派统治下的繁荣景象（右）。

尽管波旁派厉行节俭，但他们主宰的热心建立自由企业的政府对当时人们要求成立一个委员会以规范铁路对商业运输的收费标准的呼声还是做出了回应。他们还建立了农业部 and 公共卫生部、农业试验站、农业和机械学院、教师培训学校、妇女学校，甚至州立非裔美国人学院。

对波旁式领导人的多样性，也不能加以简单解释。当时的民主党是一个联盟大杂烩，为了对抗重建激进分子，他们把联邦主义者、分裂主义者、商人、小农场主、南部山区农民、农场主，甚至一些共和党人拉进自己的队伍，因此民主党人，即使是那些被称为波旁派的人，也经常各行其是。自从控制局面后，波旁派政府无论是在理念上还是在政府内部从未完全统一团结。

波旁派统治最自相矛盾的也许是，这些白人至上的典型代表们容忍黑人在政治上挥之不去的声音，并不急着加强种族隔离的屏障。在19世纪80年代，南方政治一直异常开放和民主，64%的黑人和白人合法选民参与选举。在1900年之前南卡罗来纳州立法机构由非裔美国人主持，在1908年前佐治亚州立法机构也由他们主持，其中一些人是民主党人。在1900年之前，除一次之外，在每次选举中南方都会安排黑人国会议员前往

华盛顿，但他们始终代表着被操控的地区，在那些地区大多数的非裔选民已经让人事先安排好了。在波旁派统治期间，黑人被剥夺选举权的事件时有发生，它发生的频率足以确保白人控制南方各州。这是地方局部问题，主要是使用欺诈和恐吓手段。

一种类似的变通伎俩也被用于种族关系的其他方面。内战结束后不久，种族界限还没有20世纪时那么严格。可以肯定，重建工作结束之前一些地方就出现了种族隔离，特别是在学校、教堂、饭店和公寓里，以及在私人社会关系中；在公共场所，如火车、车站、影剧院和冷饮处，种族歧视时有发生。

新南方提倡者及其盟友——波旁派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他们协调了传统与创新的关系。他们的种族政策相对温和，至少在19世纪90年代是这样。他们对新生事物非常支持，其程度足以消除对手的怒气，并能够控制局面。波旁派政府促进了工业发展，把南方带入了一个新的经济时代，与此同时还保留了对老南方神话般的崇敬，他们在南方留下了永久印记。正如历史学家C.范恩·伍德沃德指出，“不是激进派，也不是邦联分子，而是拯救者为现代南方的种族问题、政治、经济和公共机构奠定了长久的基础。”

剥夺非裔美国人的投票权 19世纪90年代，温和的种族关系不复存在了。世纪之末“畏惧黑人症”十分盛行，横扫南方和其他许多地方，其中一个原因是，许多白人憎恨黑人所取得的初步成功及社会影响。亚拉巴马州的一位报纸编辑宣称：“受过教育的黑人维护自己的政治权利时，我们气得火冒三丈，我们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在侵犯我们本土人的优越权利，是对我们管理国家事务的一种挑衅和威胁。”

教育带来启蒙，人们一直认为理应如此。纳什维尔的菲斯克大学是一所纯黑人大学。1889年该校学生创办的报纸预测，在19世纪末种族关系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并强调内战结束后出生的新一代非裔美国人将受到良好的中学和大学教育，他们有决心获得真正的平等，他们将比父辈更自信，不再像父辈一样顺从。这位编辑宣布：“我们不再是25年前奴隶制度的产物，绝对不是。”而且有越来越多年轻白人同样决心让“黑人获得地位”。

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和20世纪的前20年，种族暴力和镇压此起彼伏，到了19世纪末，所谓的新南方又回到了旧南方的老样子。执政的白人把自己的意愿无情地强加给黑人生活的各个领域，强制执行种族隔离和种族征服，阻止黑人参与投票，并颁布种种“吉姆·克劳法”¹，对公共场所实行种族隔离做了种种规定。事态以这样的方向发展不符合内战和黑人解放的逻辑，而是白人精英和恶棍精心算计的一个结果，其目的就是要限

¹ Jim Crow，对黑人的蔑称。Jim Crow Laws即吉姆·克劳法，泛指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主要针对非裔美国人，但同时也包含其他族群）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编注

制非裔美国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

19世纪90年代的政治动态加剧了紧张的种族关系。民粹主义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抗议运动组织，在90年代凝结成美国第三个政党。民粹主义的兴起分散了白人的选票，在一些地方到了黑人选票可以左右结果的地步。一些民粹主义者拉拢黑人选票，并有意安排他们进入该党领导层。为回应他们的举措，波旁派重提种族问题，并加以巧妙利用，手法十分老到，同时为自己提名的候选人在种植园控制了一大部分黑人选票。然而波旁派很快自食其言，并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认为黑人选民应该从南部选举中剔除出去。南方有些县有大批黑人，在那里，经济富裕并受过教育的民主党人首先提出剥夺选举权的问题，他们想借此清除黑人及贫困白人的投票权。1894年路易斯安那州州长表示，“无知，丑陋，贪婪，并对国家没有任何用处的人”应该被剥夺投票权。一些农场领导人希望，如果剥夺黑人选举权，即使白人在政治上出现分歧而使选票被分散，也不会再出现“黑人主宰”的黑色幽灵。但是第十五修正案绝对不允许剥夺黑人的投票权，因此他们就通过间接手段剥夺选举权，比如说用人头税和文化测试等手段来达到目的。

密西西比州率先剥夺了黑人和贫困白人的绝大部分选举权。1890年该州召开了一次宪法会议，修改了1868年激进宪法关于普选权的规定。第一，对选民定居时间有要求，在本州定居两年，其中一年在选举区定居。这对那些非裔美国佃农是一种打击，因为他们为了寻找更好的机会每年迁居，并习惯了这种迁居。第二，有犯罪记录的选民将被取消投票资格。第三，所有的税收包括人头税必须在投票之前缴清。这对贫穷白人和黑人最为不利。第四也是最后一条，所有选民都必须识字。此外，还专门为不识字白人设计了一项变通的条款，即“理解”条款：如果选民无法读懂宪法，但能够“理解”宪法并令登记人员满意，就有资格投票。登记人员宣布黑人识字的情况远比白人多，这一点也不奇怪。密西西比州的这一方案在后来的20年里被7个州所效仿。

其他州在密西西比方案中增加了一些变化。1895年南卡罗来纳州增加了一项限制性条款：经评估拥有财产超过300美元者即使是文盲也有资格投票。路易斯安那州于1898年发明了“祖父条款”，该条款规定，如果父亲或祖父在1867年1月1日已经有投票资格，即使文盲也能投票，但是1867年1月1日之前非裔美国人被排除在选举之外。到1910年，佐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弗吉尼亚州、亚拉巴马州和俄克拉荷马州纷纷通过了“祖父条款”。此外，南方各州在1896年到1915年间纷纷举行了民主党候选人初选会，这成了共和党势力隔离地区之外唯一有意义的选举。除了几个无关紧要的例外，民主党候选人选拔会排除了所有非裔美国人。这些措施的效果只要看几组数据就显而易见：路易斯安那州1896年在册的黑人选民是130,000人，但是1900年只有5320人；根据

包括市内有轨电车、宾馆、酒店、医院、娱乐场所、体育场所和就业。1900年《里士满时报》表达了这种流行的观点：

很有必要在南方生活的各种关系中使用这一原则。万能的上帝划清了人种的界线，这条界线不能抹去。黑人必须待在自己的这一边，白人也必须待在他们那一边，双方越快认识并接受这一事实，对双方就越有利。

黑人种族隔离法怂恿了耸人听闻的暴力，且无人过问。1890年至1899年美国平均每年发生188起私刑致死案，其中82%发生在南方，32%的受害者是白人；从1900年至1909年美国平均每年发生93起私刑致死案，其中92%发生在南方，11%的受害者是白人。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一位年轻的主教派教会牧师说，那帮极端分子“原来只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黑人的选举箱，现在又用同样的方式攻击他们的学校、他们的劳动和他们的生活”。

在19世纪末期，种族歧视合法化，政府承认的种族偏见因此转变为南方正式的生活方式：公共设施被隔离，黑人选举权被剥夺，治安维持会执法被挑衅，在光天化日之下对黑人进行残暴私刑，将黑人私自处死，发动反黑人种族暴乱。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本杰明·蒂尔曼于1892年宣布，黑人“要么接受从属地位要么被清除”。

那么非裔美国人对种族主义复活及种族隔离合法化的反应如何呢？有些人离开南方寻求平等和机会，但是绝大多数人留在原来的地方。面对巨大的白人势力和执法偏见，很多人顺从白人的强权和隔离。弗吉尼亚一个名叫詹姆斯·普伦基特的黑人解释说：“总得平静地生活。只要做错一点小事，他们就饶不了你。”

但是顺从并不意味着完全屈服。由于南方黑人被排除在白人世界之外，他们又渴望避免冲突，因此自19世纪90年代以后他们越来越倾向于向内部发展，逐渐形成了自



私刑

在这幅1911年的雕版画中，白人正在以私刑处置一名黑人，他曾经是奴隶，被控谋杀一名白人妇女。

己的文化，并培养了种族自豪感。1910年，一位来到密西西比游览的白人青年注意到，他所碰到的每个黑人几乎“都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角色，一个展现在自己种族人面前，一个展现在白人面前”。

黑人教堂成了黑人社区生活的枢纽，通常情况下这是非裔美国人自己唯一的公共场所，黑人们不仅在那里祈祷，还在那里进行与宗教无关的社交活动、集会、俱乐部会议和政治活动。教堂为男人提供了施展领导能力及体现政治地位的场所，其作用尤其明显。做一个副主祭是一个黑人梦寐以求的最受尊敬的角色之一。教堂帮助黑人培养了种族自豪感和个人自尊，使所有阶层的黑人互相交流并担任那些被大社会剥夺的角色。宗教生活给予他们莫大的安慰，让他们忘却日常生活的艰辛，忘记隔离，忘记与之相关的不公正待遇。

有意思的是各州实行的种族隔离为黑人们提供了新的经济机会，并诞生了黑人企业家阶级，这不能不说是种族隔离的一种讽刺。他们在南方隔离区为黑人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保险、银行业务、葬礼、酒吧、理发等。与此同时黑人们组织自己的社交俱乐部、兄弟会或其他组织，这些组织给予同胞关怀，并提供服务机会，帮助黑人们增强了自豪感。比如，独立兄弟会是规模最大的黑人兄弟会，1904年其会员超过了40万。

为了提高种族地位，中产阶级黑人妇女在南方乃至全国建立了成千上万的组织，并形成了组织网。妇女俱乐部是自己社区社会服务的引擎，她们照顾年老体弱者、孤儿和被遗弃者，为单亲母亲建立家园，为工作的母亲照顾孩子，为妇女开设家庭经济课堂，还筹资兴办诊所。1896年全国上下的妇女俱乐部领导人汇集一堂，组成了全国黑人妇女联盟，该组织的宗旨就是与种族主义



艾达·B. 韦尔斯 (Ida B. Wells)

艾达·B. 韦尔斯在抚养4个孩子的同时，致力于反对种族歧视，是第一个为反对歧视而进行起诉的非裔美国人。她推动成立了全国黑人促进联合会，要求赋予妇女选举权。



W.E.B. 杜波依斯 (William Edward Burghardt Du Bois, 1868—1963)

美国历史学家，黑人教育的执着倡导者。他反对华盛顿的迁就主义做法，提出黑人教育要走出职业教育的藩篱，培养领袖。

和种族隔离做斗争。第一任主席玛丽·丘奇·特雷尔告诉成员们说，她们有义务为那些“卑贱的、没有文化的、甚至是丑恶的人服务，尽最大努力改造她们，提高她们的地位，因为我们血肉相连，姐妹情深”。

艾达·B. 韦尔斯 那个时代有一个最敢直言的黑人活动分子，名叫艾达·B. 韦尔斯。1862年她出生于密西西比，生来是奴隶，曾在一间由白人牧师执教的学校读书。1878年，一场黄热流行病夺取了她的双亲和一个兄弟的生命，为更好地担负起照顾5个弟妹的责任，韦尔斯16岁时谋了一份乡村教师的工作。大约1880年她迁移到孟菲斯附近，这是一个迅速崛起的商业枢纽和文化中心。她在那里任教于被隔离的乡村和城市学校，并且很快进入该城市富有反抗精神的黑人中产阶级的社交生活圈。

1883年韦尔斯体验了白人强权的现实和势力。由于她是黑人，在火车上被拒绝提供座位，韦尔斯成了第一个为反对歧视而起诉的非裔美国人。巡回法庭判她胜诉并处罚了铁路部门，但是田纳西高级法院推翻了这一判决。后来韦尔斯发现了“第一爱好，也可以说是她唯一挚爱”——那就是新闻写作，这是她为正义而进行长期斗争的武器。韦尔斯使用笔名“Iola”进行写作，并成为《孟菲斯自由之声》(*Memphis Free Speech*)出色的编辑，这是一份反映黑人焦点问题的报纸。

1892年韦尔斯的3个朋友被一伙白人暴徒施以私刑处死，韦尔斯从此开始与私刑进行终生的斗争。恼羞成怒的白人反应强烈，摧毁了她的办公室，并威胁要私刑处死她。韦尔斯搬到纽约，继续用犀利的笔触和杰出的才华通过新闻报道抨击黑人种族隔离法，并要求恢复黑人投票选举权。1898年春在南卡罗来纳州一名黑人邮政局长遭遇私刑被处死，这激起了韦尔斯心中的怒火，为此她来到华盛顿，用了5个星期的时间说服联邦政府干预此事，但政府不予理睬。1909年她协助建立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NAACP)]，并努力推动政府给予妇女选举权。在推动黑人与白人全面平等的进程中，她的观点与布克·T. 华盛顿的迁就主义思想截然相反。

华盛顿和杜波依斯 布克·T. 华盛顿出生于弗吉尼亚，母亲是黑奴，父亲是白人，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获得在汉普顿学院受教育的机会，这是一所战后兴办的教会学校。完成该校学业之后他又前往亚拉巴马州的塔斯基吉学院深造，这是一所首屈一指的黑人学院。到19世纪90年代，布克·T. 华盛顿已经成为美国最著名的黑人教育家。他坚持认为，黑人只有首先建立赖以前进的经济基础才能进一步争取社会平等。1895年他在